

红军创建首支无线电队伍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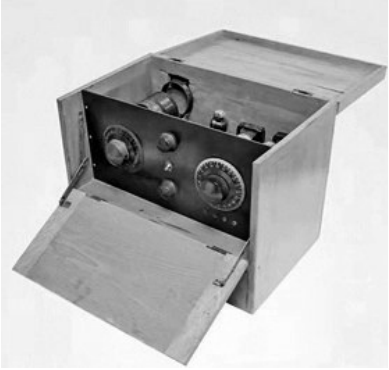
“人民通信兵从缴获的半部无线电台起家,在战火中迅速成长壮大,成为我军一支重要的作战力量。红色电波传递党的声音,发布党的命令,在革命战争时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星火燎原的土地革命到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从烽火硝烟的抗日战争到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再到众志成城抗美援朝战争,红色电波保障了战场指挥通信,确保我军行动协同高效;开辟了隐蔽战场,加强对敌情报侦察对抗;建立舆论宣传窗口,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

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在中央苏区组建。此后,红军利用战场缴获、办班培训、实时运用等方式,克服电台装备短缺、通信人才匮乏、运用经验不足的困难,发展壮大了我党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为中央制定决策部署、部队灵活快速行动提供了有效的情报和通信保障,对突破敌人军事封锁,赢得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在组织“围剿”红军行动时,国民党已拥有长波电台,并使用摩尔斯电码发报,而红军还主要依靠骑马、传令兵、哨音、军号声等运动通信和简易信号通信。毛泽东曾感慨,没有无线电通信,部队联络不通,严重影响了作战指挥。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余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12月底,敌第18师两个旅深入苏区腹地龙冈。战斗中,红军趁敌立足未稳,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敌,活捉师长张辉瓒,并缴获其使用的1部弹簧式灯座的15瓦无线电台,电台的收报机和充电机完好,但发报机损坏,无法进行正常通信联络。电台的报务员王诤、吴如生、韦文官、刘寅和机务员刘盛炳等人,经过动员自愿参加红军,成为红军第一批报务人员。3天后,红军在东韶战斗中歼灭敌军第50师,缴获了1部完整无损的15瓦无线电台。1931年1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亲切接见王诤等人,并授命王诤着手组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班组。朱德指着缴获的电台说,“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

1931年1月6日,红军总参谋处的东屋被布置成“报房”,王诤等人对这部半电台进行第一次安装调试机。此时,这部半电台还不能建立无线电通信,只能用来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经过调试,电台接收到第一束飞驰的电波。毛泽东第一次看到电台送来的电讯新闻后称赞:“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啊!”此后,红军开始利用这部电台捕捉敌军电台信号,了解敌人动向,为红军把握战机、正确决策、出奇制胜提供了有力保障。

1931年1月中旬,红军在江西宁都小布镇组建了第一个无线电队,王诤为队长,冯文彬为政委。后来,中共中央又派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



来到中央苏区,加强了无线电队的能力。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对无线电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朱德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去电台问问,有没有什么新闻。毛泽东也非常看重无线电通信,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从闽西向赣南的兴国地区集结,为突破敌人包围圈,需利用夜色从两股敌人之间相距约20公里的缝隙中跳出去。行动开始后,各级指挥员和政工干部深入连队,要求严格做好行动的保密工作。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在夜色中还有一个可能暴露红军行踪的漏洞——电台的无线电信号。他马上找来电台人员询问,得知缺少电键,电台就不能工作。于是他派人收集来电键交给警卫员并交代:不到目的地,不许任何人拿走电键!

针对以前在国民党军工作的技术人员,毛泽东多次指示,要做好电台人员团结工作,政治上要信任,甚至亲自指定王诤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对于无线电技术人员的业务管理和生活安排,即使当时红军经费紧张,给养匮乏,无线电人员每月津贴相比普通战士也只多不少,还优先配备了运输马匹。在红军领导人的关心下,无线电通信队伍逐步壮大。

红军无线电队成立后,主要依靠留用原国民党军的技术人员。红军总部意识到,要充分发挥无线电台作用,迫切需要无线电技术人才。1931年1月28日,毛泽东、朱德联名签发《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在江西宁都组织第一期无线电培训。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经常抽出时间给训练班作形势报告、上政治课,毛泽东鼓励大家尽早建立空中桥梁,把被分割的苏区用无线电波连接起来,朱德则勉励大家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当时,训练班教学条件非常简陋,学员们把树荫当课堂,石板当桌子,用左手大拇指当作电键来练习,铅笔用到手指捏不住了,还套上小竹管继续使用。4个月里,王诤为学员们教授报务和

在复杂激烈的反“围剿”斗争中,王诤提出可以用收报机侦收敌电来获取情报。他让通信班天黑后把天线架在山顶,提升通信效果,天亮前撤回以免暴露。当时国民党军队译电机关和指挥官还没意识到无线电保密的重要性,每次电台开始联络时,就先明语问对方在何处、谁在主要方向,王诤和无线电通信队成员就不分昼夜地监听、捕捉敌军电台有用信息。王诤熟悉国民党军队电台呼号和电台报务人员发报手法,因而能从收报机信号中判断发报人姓名,进而判定敌军到达时间、地点、番号、分布和行动意图,掌握敌人的行动方向、退却路线、到达位置、指挥命令等信息,为红军总部领导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红军依托这些重要信息集中兵力,从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环节实行突破,直接促成了第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红军捷报频频传来,毛泽东在苏区军民集会中高兴地说,我们工

机务,还用木块、铁片制作电键,用旧铜线制造电码训练器等训练器材,供17名学员练习,培养了第一批无线电通信人员。

当时,由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严密封锁,生产通信器材物质条件困难,王诤发动大家就地取材,把铜钱熔炼成薄铜板用来加工制作电器元件,将羊角研成粉末压制成胶木件代用品。在无线电队伍官兵的不懈努力下,红军最终组成了中共中央无线电通信网。

此后,训练队扩建为红军通信学校,直到长征前夕,共举办无线电训练班11期,先后培训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1931年5月,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了国民党军公秉藩部的一部功率为100瓦的电台。无线电技术人员通过这部电台,与上海中共中央取得了通信联络。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开幕。在会场不远处的几间土房内,王诤、刘寅等红军电台的技术人员,通过之前缴获的那部100瓦的电台进行文字广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的消息,很快化作空中电波传向远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最早对外播发新闻的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即新华社前身),由此宣告成立。我党第一次通过无线电台越过了敌人的“铜墙铁壁”,向全国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和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喜悦,向全国人民传播了胜利的佳音。

(据《学习时报》)

读史忆人 典故

梁兴初口袋里的“救命银圆”

梁兴初1930年加入红军后,因作战勇猛,很快当上了班长。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他率领全班勇猛冲杀。当发现一个敌人向战友开枪时,梁兴初为救战友,用身体挡住了敌人射来的子弹,负了重伤,仍坚持不下火线。

战斗胜利后,梁兴初因失血过多,导致昏迷,被战士们抬下阵地,送往后方医院治疗。梁兴初刚一恢复,就要求归队杀敌。但医院认为他尚未痊愈,要求他继续住院。随后,梁兴初便外出跑步,坚持锻炼身体。

一天,梁兴初在跑步后,看到一个中年妇女在街上号啕大哭,于是问发生了什么事。这位妇女回答道:她家丈夫不幸患病,本想养几只大鹅换钱给丈夫治病,但是有人用假银圆骗走了她的鹅。

梁兴初听后非常同情,告诉这位妇女会联络负责治安的同志帮助抓捕坏人,找回银圆。但这位妇女认为“远水不解近渴”。梁兴初为了让她能够及时给丈夫治病,立即掏出自己珍藏的一块银圆交给了这位妇女。这块银圆是梁兴初的母亲在他离开家乡参加革命时给的,梁兴初一直藏在身上舍不得花。如今这位妇女有困难,梁兴初二话不说,把这块银圆送给了她。

妇女在离开之前,把那块假的银圆交给梁兴初做纪念,并承诺有了钱一定归还。梁兴初一面随手把假银圆放进口袋,一面告诉妇女不用还了。

不久,梁兴初伤愈归队,率领战士们和敌人作战。一年后,梁兴初率部参加第三次反“围剿”战役,在黄陂战斗中,已经是连长的梁兴初带领部队向敌人发起冲锋,突然被敌人射来的子弹击中胸口,倒在地上。战士们急忙将他用担架抬下战场急救,哪知梁兴初很快从担架上跳了下来。战士们感到不可思议,仔细一看,原来梁兴初虽然胸口被击中,但子弹却被口袋里面的什么东西挡住了。梁兴初一摸,发现口袋里放着的是那块假银圆,帮他挡住了子弹。不久,和梁兴初熟识的战友向他表示祝贺,说他“这是好心人有好报”,梁兴初回答说:“这是人民救了我。”由于有了这一次的经历,梁兴初便将那块假银圆一直放在身上带着。

解放战争时期,梁兴初率部参加辽沈战役,指挥部队在黑山与5倍于己的敌人激战。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敌人溃退。梁兴初立即命令部队发起反击。战斗进行中,为了观察敌情,梁兴初举望望远镜,将身体探出战壕,突然飞来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左胸。指挥所的同志急忙将他抱起,准备送去后方医院。谁知梁兴初又若无其事地站了起来,继续指挥战斗。原来,子弹再次击中了 he 口袋里的那块假银圆。

(据《人民政协报》)

古人也爱逛夜市？盘点古代的“夜市经济”

—— 拾遗 ——

钱钟书鼓励学生看电影

1938年,钱钟书来到西南联大担任外文系教授。当时,他给学生开设了三门课程:大一英文、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以及现代小说。在日常的教学中,钱钟书发现如果用中英文两种语言交叉为学生上课,大家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为了提高学生们的英语听力,钱钟书上课时便只说英文不说中文,而且要求大家也不要讲中文。除此之外,钱钟书还想到了另外一个提高大家英语水平的方法。

当时,昆明建成了好几家影剧院,常常播放欧美流行的原版

片,看电影成为一项时髦的娱乐活动。一天,钱钟书忽然微笑着向大家提议:“以后大家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多去影院看一些外国电影。”看到大家疑惑的眼神,钱钟书解释道:“看外国原版电影,也是提高英文水平的一种方式。不过,这可能要花掉大家一部分生活费。如果手头困难,尽可以来我这里借钱。”由于当时的电影票非常便宜,同学们大都能看得起,所以也没有人向钱钟书借过钱。

钱钟书还曾自掏腰包,请全班同学看过两场电影。

(据《天津日报》)

许渊冲的“痴”与“狂”

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个子矮,嗓门大,素有“许大炮”之称。

许渊冲在翻译方面非常痴迷。许渊冲专攻的领域是将公认为不可译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楚辞》《论语》《诗经》《道德经》《西厢记》《牡丹亭》等翻译成英、法文版本。他不仅要翻译,还要求译本必须音美、形美、意美;原著中有比喻、借代、拟人、双关、押韵的,译本也必须如此。这样的难度,常常把许渊冲“折磨”得狼狈不堪。卡壳时他如坐针毡,灵感来了又眉开眼笑。大学问家顾毓琇称赞道:“历代诗词曲译成英文,且能押韵自然,功力过人的,许渊冲实为有史以来第一。”

1998年,德国交响乐团来北京演出,并特意说明演奏乐曲中的《寒秋孤影》和《青春》,是根据中国唐诗创作的。现场听众中有很多

专家,但都没听出这两章的出处。这件事,被当时媒体喻为20世纪的“斯芬克斯之谜”。后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作出批示,一定要尽快把德国艺术家演奏的那两首唐诗搞清楚。许渊冲根据德文译者惯用的译文习惯,分析出了这两首唐诗的出处:《寒秋孤影》源于张继的《枫桥夜泊》;《青春》源于李白的《客中行》。

许渊冲的名片上写有一句话:“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看起来很“狂妄”,但许渊冲却自有他的底气。2014年,许渊冲摘得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许渊冲曾说:“中国人,就应该自信,就应该有点狂的精神。咱们国家的科技、军事、商业都在走向世界,所缺的,就是文化这一项,我要填补的,也是这一项。”

(据《人民政协报》)

“夜市”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今天,夜市随处可见。但夜市不是现代社会的专属品,它由来已久,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晚唐诗人杜荀鹤就在《送人游吴》一诗中描述了苏州夜市的盛景: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
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
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
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

尽管古代没有“夜经济”一说,但“夜市”作为“夜经济”的重要形式,肇始于殷周之际,渐兴于汉唐、盛于两宋,并延续元明清诸代。



夜市在宋代真正开放并形成规模

“夜经济”其雏形为“夜市”

说起“夜经济”,古已有之,其雏形为“夜市”,原本为开设于夜间的买卖街市,后泛指夜间商贸及娱乐消费活动。

早在殷周之际,“夜经济”已有了雏形。《周礼·同市》云:“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阳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朝市”即早上及白天的市场,多是商贾之间的“大生意”,而“夕市”即夜市,为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后一般市民与小商贩之间的“小买卖”。

两汉时期,夜市逐渐繁盛。东汉学者桓谭在《新论·离事》中已有关于夜市的记载:“扶风漆县之郾亭,郡言本太所处,其民会日,以相与夜市,如不为期,则有重灾眚。”史籍中对唐中晚期夜市的记载比较明确。诗人王建在诗中称之:“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因唐代居民区与商业区严格分隔,夜幕降临,街鼓响起,城门、市门与坊门关闭。韦述《西都杂记》称:“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弛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当时的都城长安(今西安),由执金吾(守城官吏)每晚以鼓声告知百姓,“禁夜”开始,只有正月十五可以开放三天,设有夜市,实为灯市。

通州夜市至晓不绝

元代忽必烈定都北京后,在金中都旧城东北部兴建新的宫殿和都城,并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命枢密院发军五千,雇役千人开浚通州水路”,使漕运直抵大都,“千楫万艘,辐辏云集”,由此促进了北京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明代朱棣迁都北京后,繁密的人口、辐辏的商旅、畅达的交通,使京城的商业有了快速发展,夜市也曾繁盛一时。其中以“东单、西四、鼓楼前”三大商业区最为繁华。而清初受战乱影响,经济萧条,直至康熙年间才开始恢复。但因清廷实行满汉分居制度,当时京城商业区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即大栅栏、琉璃厂一线。由于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使京城的夜市规模受到较大影响。但有一处的夜市较为繁荣,这就是地处京城东部的通州。

据《古韵通州》记载:自元代以来,通州因地处运河北端而成为漕运重镇。尤其是大量南方漕船与民船停泊于运河中,“众船相接,江上便成陆地”,由此促进了通州的商贸活动,包括“夜经济”。当时通州城最为繁华的地段是东大街一带。每到夜间,各商铺门前都要悬挂数十盏羊角灯,照耀如昼。游人与卖人亦持灯往来。整座夜市呈现出“千灯照碧,云高楼红”的繁华景象。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士龙作为朝鲜使者前往北京,正月二十八日返程途中在通州留宿,但见“店门市肆上下烛光照耀,开门迎客。据《通州史话》载:通州夜市历史悠久,清代已突破时间限制,“悬灯开市,达夜买卖”“往来交易,至晓不绝”“夜市之繁胜于京城,南商北客云集,水货山货无不充市。”

(据《北京晚报》、济宁市博物馆网)